

刚在医院最后送别朱维铮先生，媒体记者的电话就接连而至：作为朱先生多本著作的责任编辑，能否说说对他的印象？浑身乏力、心绪纷乱之际，我只回了一句：“真正的男人。”直到夜深人静，稍稍缓过神来，才补发了这样的短信：“一个有学问、有个性、有担当、有魅力的学界名师。”

其实，朱先生的学问，无论是经学史、史学史，或是思想文化史等等，不仅有他自己呕心沥血的传世论著，还有众多得其亲炙的受业门生，根本轮不到我辈胡诌八道。唯其爱书如命，家中厅里房内、架上地下，到处书满；甚至人在病榻，还手不释卷，则为我等平日确确实实的亲眼目睹。而对自己的著述、编校文字，朱先生更是字斟句酌，极尽考究；不到满意，决不交稿。排出之后，反复校阅；字字句句，一丝不苟。每有重印，还常以手头勘订之本嘱改，容不得半点微瑕小疵，哪怕是一处标点符号……在他赠我留念的《走出中世纪二集》特印精装本前手书长题中，有这样的话：“忆荆公题柯山诗，谓比照香山诗手草及成稿，‘看似寻常最奇崛，

人有个性魅力，书见学问担当

——纪念朱维铮先生

成如容易却艰辛。’鲁钝如余，虽竟夜沉吟，拙文仍不脱寻常。”这也许正是他一生治学的写照和永无止境的追求。

朱先生有个性，学界皆知。然脾气虽大，但认道理；要求“苛刻”，却欣赏“较真”。凡出版社向他约稿出书，唯一不能商量的条件是：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认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删改，理由是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我曾不止一次地亲听其批评某大出版集团将许多名家著述纳入“统一丛书”，再组成所谓的“丛书编委会”，由位高权重者充当主任的做法，怒斥其人“不是个东西！”并严正声明：凡我以前在该社出版的所有著作，未经同意授权，一本也不准列入此中！“而对平时书稿编辑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学术性的疑问，还是技术性的细节，则都认

真听取，耐心解释，不怕争议，从善如流。因为他一贯恪信：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在一本朱先生书稿的编校过程中，我曾以不能确定的大小疑问若干，用传真发给当时正在台湾讲学的他，请求定夺。很快便得到一一回复，巨细无遗。并以“甚是。照改”、“很好。从尊见改”这样的事实求是，鼓励编校人员“斤斤计较”，以尽量消灭包括手民误植在内的各种“硬伤”。碰到书稿中一些似乎有“重大责任”的问题，朱先生更是勇于担当，不“为难”他人。有一次，还就其书稿中一个与所谓现行“主流规定”不一致的概念名词，专门补写一条注解。既从学术的角度，阐明其坚持己见的理由，又以真正文责自负的明确承担，体谅出版方因

◎ 陈麦青

种种因素而“取舍两难”的尴尬。在朱先生主编的书中，照例要在“前言”或“后记”中详列分工，不仅不掠合作者哪怕是其学生之美，更强调凡有错误，概由他一人负责。今举其率门下邓志峰、张芳、刘文楠、姜鹏诸君编校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为例：

这部著译集的编校，是我与四位小友共同完成的。他们分别查勘不同版本，进行会校，每种都做过详尽的校勘记，由此筛选出较合历史原貌的底本，然后区分句读，初施标点，并予分段，同时也辑集了每一种的研究材料。正因为他们做了奠基工作，我才可能在较短时间通读全稿，推敲全文，订正字句，修改标点，择定校记，以及撰成每种简介。因此，这部著译集是我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当然，编校存在的任何错误不

当之处，都应由我负责。尚祈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正！

类似这样的话，几乎在他主编的每一种书里，都能见到。而为了以原先分篇各撰辑集而成的《马相伯传略》的署名问题，他坚持提出，不能只以“朱维铮等著”了事，而须全列作者姓名。后因从书封面设计关系，实在没有办法，协商之下，最终还是在内封分署各篇作者之名，连有关资料辑录者，也都在每篇后的出处中一一注明。

如今的复旦，几可谓“教授满街走”，但真正让人从心底里敬佩的，也许远远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多；而被公认为有味道、有魅力者，恐怕更少。朱先生则绝对在极少数两者兼具的名师之列。君不见，无论是校内校外的小课大课，还是公众传媒的各种演讲，其敏锐精辟、妙语迭出的学识风采，曾让多少聆听者为之折服倾倒；那些经过长期认真研究、严肃思考，又被化为深入浅出、简要明了的心得之语，也往往很快成为不胫而走的流传名言。

朱先生走了，把学问、担当留在了自己的书里，把个性、魅力留在了大家的心中。

上海书店出版社新一批“海上文库”共推出6本。至此，“海上文库”已有64本精装,9本平装的规模。

《覆水年华》由叶扬发表在《上海书评》等报刊上的文章集结而成，书名“覆水年华”来自书中收录的读《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和《陈方恪诗词集》那篇文章。该书主要分文学鉴赏和文化观察两部分。叶扬主修比较文学，对英美文学浸淫深厚，这部分造诣体现在本书收录的《诗人艾略特》、《“失乐园”中得乐园》等篇目。

《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收录了出版人俞晓群对现代十一位出版大家和关心出版的学问家的考察和理解。作为一个“爱书、懂书又做书”的出版人，作者以细腻流畅的

“海上文库”新出六本

◎ 马睿

笔触，娓娓道出巴金、陈原、王云五、张元济、周振甫、邹韬奋、胡愈之等十一位前辈出版人的故事，以及对于书业历史和现状的思考。

《光芒与河流》系费振钟回忆性的随笔散文，分为少年记、种菜记、读书记和乡亲记四个部分，既有对过去时光的怀念，也有对当下生活的热爱和感悟。用作者的话说，“‘你寻索语言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有时候，我们可以不要问题，只要语言，因为你只是揣摩思想，然后说话而已。”

《威尼斯画记》是此次6本书中唯一一本四色、双色交错印刷的书，旨在全面展现李黎边画边记的威尼斯。几年前，作家李黎“放下偏见与执着，摒除虚妄的杂念，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谦虚地做一名绘画课的学生。”她白天看美术馆、写生、摄影，夜晚伏案书写详细的笔记，最终形成眼睛和画笔共同完成的书，从作家和绘画学生的双重视角展示了一个别样的威尼斯。

《此生》是“海上文库”第二次收入张新颖的作品，延续之前《迷恋记》的平静温和之外，也与同期

的另一本讲现代中国文学人、文、事的随笔集《有情》呼应，以小见大，用随笔的形式，写出了作者特有的情深意重。书名《此生》缘起文中收录的谈杨德昌电影的一篇文章，《此生就是我们最切身的事》。

《行走在消逝中》的主题恰如其名，主要讲译制片、配音、老电影、京剧、老舍话剧等“美好年代”的往事和记忆。作者孙洁，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资深票友，由爱好而专业，和童自荣等知名配音演员都多有交流，知人论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更添一层温情。

史华兹是当代杰出的美国汉学家，他的学术研究涉及中国古代、近现代的思想研究，他所著的《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一直是国外汉学家学习的圭臬，史先生在一九九九年逝世前仍奋力打起精神完成了临终遗著著作《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史先生选择了使用带有与“终极关怀”相关的宗教语言，来描绘以罕见而剧烈的方式把人类从“人生苦难和绝望的巨大重压下”拯救出来的宗教信仰——借以作为比喻，来探讨新兴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性质及其涵义，这样的做法显示着他所看到的此种新现象的出现，是多么地严重。

我们国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在哪里？史先生所形容的，经由失控的消费主义、大众传播媒体无远弗届的效应、以及一般大众认同名人行为的风气所带来的精神和思想上的空虚。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扩展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致向其忠实信徒许诺：只要“完全专注于从科技经济那边看待人生每一方面”，便能有“一套全新的方式，来消除长久以来一切人生苦难的成因”。因此，我们有正当的理由称其为“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因为这样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超脱了生命中所有的紧张和痛苦，并使其忠实信徒“升入一种得救的境地”。然而，就人作为人而言，得到越多的物质享乐和满足，就越能过得更美好、更幸福吗？



寻找“道德之问”的答案

◎ 成润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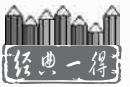
每当我忙完一天的工作以及在家后的俗事后，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的书房，面对着整齐的躺在书柜中的中华文明历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的伟大经典，我不停地在书中寻找“道德之问”的答案。突然之间，老子《道德经》映入眼帘，《道德经》不正是“道德之问”的答案吗？

《道德经》第十二章中说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意思是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眼花缭乱，嘈杂的声音使人听觉失灵，浓厚的杂味使人味觉受伤；纵情猎掠使人心思放荡发狂；稀有的物品使人心行不轨。因此，圣人致力于基本的维生事物，不耽乐于感官的享乐。所以要有所取舍。

二千五百年前的经典之作中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一针见血地回答了我们现代高科技社会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经典缘何能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生命力，经典之作能成为我们当代社会人们与精神空虚和思想荒芜进行搏斗的最重要的力量，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认真看待前人在世上传递下来的人文传统中的经典之作。



盛世需要危言吗？

◎ 俞宙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詹军的《世纪博弈：中美贸易战真相与反思》（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1月）算是一本当代版的《盛世危言》，甚至作者本人写的“代前言”就起了这样的标题：“暴风雨过后不一定见彩虹——写在盛世的几句危言”。

“中美贸易”与“中美贸易战”只是一字之差，其中含义却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贸易功莫大焉——“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从1993年到2003年这10年中，中美贸易顺差增长了8.5倍，但美国海关同期的统计是增长了400多倍”，无论哪方的数据准确性更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贸易顺差使美国将大量的美元输入了中国，也为中国创造了天文数字般的就业机会。

遥想当年中美蜜月期，如此贸

易顺差是双方都喜闻乐见的。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缺外汇，“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时，国家的外汇储备从没有超过10亿美元”。这种窘境甚至惊动了邓小平，他专门向前副总理田纪文提到外汇短缺问题，说外贸逆差不解决会拖累整个国民经济。显然，美国有钱，中国有工人，简直就是梦幻组合，詹军告诉读者的一个新闻“CHIMERICA”完美地概括了这一关系。

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顺风顺水，经济领域一路走来有惊无险：汽车工业衰退，软件工业崛起；纳斯达克大跌，房地产股应声上扬；外贸尽管逆差，国内就业市场安然无恙，就算再往中国输入百亿美元又如何？或许有人要问，中国要这些绿纸有何用？君不见，

伦敦、加州、墨尔本、温哥华，一座座洋人的豪宅都被我们的国人买下，绿纸的威力可见一斑。然而2008年，风云突变，美国金融市场狼烟四起，“两房”崩盘，转眼间失业无数，更演变成而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顺理成章，原本你情我愿的中美贸易，转瞬成了你死我活的中美贸易战。

《世纪博弈》一书亦将这场不见硝烟的贸易战中，中国所具备的优势和吃亏的根子，用风趣而不失沉痛的语言向国人一一点明，所谓“上亿件衬衣换回一架波音飞机，要换到何年？”作者在书中的一个设问确实强过了许多经济学家在讲堂上的千言万语。读了詹军先生的危言，更多问题确实值得盛世中的我们深思。



《给理想一点时间》刘瑜、闾丘露薇等著，新星出版社出版，由凤凰网报编辑部从近万篇推荐博文中精选出。书中文章观点鲜明，可读性强，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博文选集。



《东京下町职人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以访谈的方式记录了根岸八种职人或艺匠自父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手艺，那种对于手中技艺的珍惜与坚持，看似微不足道，却洋溢着浓浓的人情力量。



《遗产》菲利普·罗斯著，彭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此书描述了罗斯与其身患绝症的父亲临终前一段共处的经历，既阐发了有关生死与人性的深刻道理，也剖析了犹太民族在美国的发展历史。激情与理性时而鏖战、时而讲和，努力还原生活的真相。